

中国渐进改革 前沿热点问题报告

——中央重大决策和高层政要思考的阐释

(内 部 资 料)

上 册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中国渐进改革前沿热点问题报告

——中央重大决策和高层政要思考的阐释

(内部资料)

上 册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二〇〇二年六月一日·北京

前 言

本资料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热点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有的发表在中央和省一级的报刊杂志,有的系在国际国内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或讲演,有的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研究报告,还有一些是供中央和部委领导以及集团公司高管人员参考的内部研究报告等。

这些研究报告有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有的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反响和讨论,有的在产业和企业间引起关注和争论。根据有关领导和读者的建议,我们先印内部资料大字本,供参加相关研讨班的学员参考,同时赠送党政领导和学术界、企业界专家,征求修改意见,以求完善,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版发行。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二〇〇二年六月

作者简介

张湛彬,男,1962年生,吉林白城人,中共党员,历史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从1979年起在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任职,其间在海南、北京某投资集团、文化公司、保险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多年来关注产学研的实现形式,学术上侧重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有多部专著和主编的工具书出版,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目 录

第一编 渐进改革与中国社会转型路径

第1讲	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探索的伟大先驱	1
第2讲	刘少奇“天津讲话”和私营经济的再思考	12
第3讲	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的历史变迁	20
第4讲	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44
第5讲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	57
第6讲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与当代中国大转折	68
第7讲	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	79
第8讲	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92
第9讲	渐进改革进程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108
第10讲	对“毛泽东热”若干问题的思考	117
第11讲	“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124
第12讲	“一国两制”与香港、澳门、台湾问题	136
第13讲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	146
第14讲	改革取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	157
第15讲	非国有经济的演进路径和市场化改革	174
第16讲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	186

第二编 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制度创新

第17讲	权力过分集中：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	198
第18讲	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若干问题	203
第19讲	新的革命：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	220
第20讲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	230

第 21 讲	发挥工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234
第 22 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	241
第 23 讲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和矛盾	252
第 24 讲	社会协商对话的组织和开展	256
第 25 讲	“第七次革命”: 政府机构改革进展态势及问题	268
第 26 讲	市场经济发展再次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277

第三编 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制度创新

第 27 讲	关于海南开发建设的若干问题	285
第 28 讲	海南“小政府”体制与市场经济实践的调查	289
第 29 讲	农村改革与制度变迁的社会效绩	302
第 30 讲	转型时期高收入阶层现状及成因分析	309
第 31 讲	关于通货紧缩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319
第 32 讲	西方国家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及政府对策	327
第 33 讲	经济全球化·WTO 与中国国家安全	337
第 34 讲	加入 WTO 与中国保险业的市场竞争方略	349
第 35 讲	中国新生财险企业发挥比较优势的思考	357
第 36 讲	转轨时期债转股的政策目标与配套改革思路	370
第 37 讲	渐进改革、WTO 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378
第 38 讲	搞好国有企业需要培育职业企业家	387
第 39 讲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缺失和激励制度创新	393

第四编 企业改革与经济激励制度创新

第 40 讲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绩效考察	404
第 41 讲	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缺位与约束的乏力	411
第 42 讲	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安排	421
第 43 讲	国有企业经营者实施年薪制的基本思路	427
第 44 讲	股票期权制度的由来和基本框架	436
第 45 讲	股票期权制度的方案实施与运作程序	443
第 46 讲	股票期权制度运作的政策支持体系	449

第 47 讲	西方国家企业管理层薪酬结构及长期激励机制	454
第 48 讲	西方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与发展趋势	464

第五编 产业组织与博彩经济制度创新

第 49 讲	博彩的特殊需求与政府公益事业筹资选择	470
第 50 讲	博彩行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政府选择偏好	480
第 51 讲	博彩品种的适度供给与市场、政府约束	489
第 52 讲	博彩业的价值评判与道德诉求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502
第 53 讲	关于博彩业社会收益的实证分析	513
第 54 讲	制度、技术安排和国际博彩业的发展路径	524
第 55 讲	彩票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营销创新安排	535
第 56 讲	中国彩票业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调控	545
第 57 讲	彩票基金管理规制、效绩和重新定位研究	557
第 58 讲	关于博彩和博彩业的若干问题	569
第 59 讲	中央政府决策和福利彩票事业发展	574
第 60 讲	中国博彩业公共政策的初步分析	587

第六编 社会改革与文化思想传承创新

第 61 讲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的心路历程探析	604
第 62 讲	读《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及其它	621
第 63 讲	读《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和《忆周扬》及其它	629
第 64 讲	经济学家蒋一苇的科学历史观评述	641
第 65 讲	“吴敬琏忧虑”与中国经济改革	648
第 66 讲	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655
第 67 讲	日本 NHK 对公共传媒文化的探索	658
第 68 讲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发展道路的再探索	663
第 69 讲	新的突破：从“入局”到走向“体制外”	672
第 70 讲	当代知识分子与民间机构的发展	676

第一编 改革方式与中国社会转型路径

第 1 讲 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探索的伟大先驱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夺取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接手的是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究竟如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就成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尤其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征程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也就有说不尽的刘少奇。

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潮落潮起，刘少奇这个名字总是在历史进程的前沿不息地跳动着、闪耀着。他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求实勇气，就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系统而又独到的观点，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建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建邓小平理论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今年是刘少奇诞辰 100 周年，重温刘少奇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改革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主张打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础，提出了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系统纲领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的日子里，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考虑经济建设如何起步的问题。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勾画了一个蓝图：新中国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包括要有三年五年准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建设；在这个阶段中，国营经济、合作社要有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允许大发展；在和平竞争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的因素，当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就可以通过和平赎买手段从而实现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国有化，然后分地区实行农业的集体化。刘少奇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势必“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

说明：本文系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00 周年而作，载《光明日报》1998 年 11 月 22 日，发表时七、九两题因版面原因被删减。

的斗争过程”，“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也就是说打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础是为了更好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

刘少奇强调新中国应使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性质的阶段，“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比重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其作用也要相对缩小。”这里讲的是发展趋向，但在现实实践中却要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其中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逐渐以和平方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

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系统纲领，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后来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初毛泽东是赞成刘少奇的主张的，但后来毛泽东的观点却发生转变。薄一波后来对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观点异同有过评述，他说，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泽东1952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等等。^①

1953年，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主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右倾，“阻碍向社会主义发展”。在之后的反右批判中，“左”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作法愈演愈烈。至“文革”期间，对“新民主主义阶段”进行了荒唐的大批判，把“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大创造”的独家发明权桂冠硬戴给了刘少奇。经过历史的曲曲折折，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终于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不能违背价值规律，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一认识的回归花了几十年，代价沉重，教训惨痛。应当说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思想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础打好，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在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就可能少犯许多错误。

二、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 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任务

夺取政权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什么？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

出党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指出：“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完结，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他还说，“要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他在1949年8月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把中国工业化。”同年9月，他在北京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的利益。1951年7月，他在春耦斋对马列学院学员讲话中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①在开国前后，面对百业待兴，刘少奇独把经济建设提到这样高度，认识如此深刻，实属十分难得。

刘少奇极为重视革命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根据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他指出，如果我们在解放了生产力之后，不能接着把发展生产力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他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全党肯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

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快毛泽东又抛弃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把阶级斗争提上了日程，由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重大弊端，对毛泽东个人专权否定集体智慧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却难以有效制止。于是有了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倾。1962年初，刘少奇提出了“非常时期经济调整压倒一切”，这实际等于又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夏天，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刘少奇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深，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同乡和战友的情谊也走向破裂，刘少奇主张的“中心”被彻底抛弃，并被贴上“唯生产力论”标签而反复“围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刘少奇的这一光辉思想得以继承和光大，这之中的风风雨雨，令人感叹。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三、力主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重视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術

经济落后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48年秋，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进行了缜密的思考。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思想。他说民主革命“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

刘少奇从中国现实的阶级关系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没有当过政，因此无须乎推翻。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还不是”，“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①刘少奇不仅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命题，而且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途径，这就是“可以在很大范围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租让、加工、定货等，还可以把重要国家企业或国家资源出租给私人经营或开发。”联想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和刘少奇1956年底1957年初有关允许资本家私人开设工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论述，及有关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讲话；1959年有关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1964年学习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体制，试办托拉斯的意见等等，更加使我们感受到刘少奇务实的眼光是多么的深邃。

刘少奇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的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形成和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问题上，后来我们曾犯过较长时间“左”的错误，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力求经济关系纯而又纯，其后果是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只是到了刘少奇的战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对刘少奇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才有了正确的评价，我们的国家也重新走上了正轨。在今天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展，刘少奇的相关论述对我们仍具有启迪、借鉴和指导意义。

四、重视生产也重视商品交换，主张建立适当的 市场关系并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

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相当多数对生产、流通、商品和市场的关系认识不清，尤其对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1948年刘少奇说：“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①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中，刘少奇尤其强调了市场作用，强调政府要调节市场。尽管刘少奇提到的“市场关系”与我们今天讲的“市场经济”还不能说完全一样，但应当看到，刘少奇强调的“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等“市场问题”实质上已洞悉了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56年11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1959年，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受苏联影响，有些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根本不存在价值范畴和商品生产了，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刘少奇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指出两种所有制并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之一。将来如果没有两种所有制了，也恐怕还需要有商品。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观点无疑是值得珍视的。

八大以后，随着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某些干部为了减少矛盾，主张关闭自由市场。刘少奇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②刘少奇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自由市场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对自由市场不能简单采取取缔的办法，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方法”。在同自由市场的竞争中，国营经济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并且由于国营经济有雄厚的实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②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191～192页。

力和国家的支持，一定可以竞争过自由市场，而不会被自由市场所操纵。用经济竞争而不是用取缔的办法对待自由市场，好处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经济搞得更灵活和更多样，更大程度满足人民的需要。刘少奇认为，经济计划是主观的，市场需求是客观的，“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在价格、资源配置、商品分配上采取灵活的政策，这样，就可以使生产符合客观的要求。这种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思想反映了刘少奇对计划体制弊端的反省。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先后八次听取关于物资工作的汇报。他认为，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要有物资做保证，必须有一个统一管理和经营生产资料的流通部门。他指出：“实际上物资部门也是商业部门，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他提出建立市场，放开贸易。1965年9月，他又强调：“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为此刘少奇还从机构设置、经营方式、资金筹措、仓库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物资流通管理体制的具体意见，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作出了贡献。

五、提出要长期保存富农经济，侧重在供销和消费合作上把农民组织起来

保存富农经济，是建国前与建国后土地改革政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突破了毛泽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的策略，并不顾斯大林“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的意见，提出要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主张，提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这是刘少奇对富农经济的再认识，这个再认识源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阶段经济关系的整体设计。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正确主张，很快被合作化高潮吞没，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仍需要再认识。

刘少奇极为重视合作社经济的作用，反复强调合作社是党和国家用以帮助、领导、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是国家经济的广大而又可靠的同盟军。他强调的重点在供销合作和消费合作，而不在生产合作，即先“供销”，后“生产”，从流通环节上把农民组织起来。他认为，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的机械化，搞不了集体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刘少奇早在二十年代就试办过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五十年代初，在农村和城市合作化进程中，他多次提出股份合作设想。他认为农村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提高基础上，批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战胜农民自发因素，是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强调：“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贫穷的基础上建不成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批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过两次争论。即：1950年春围绕富农问题，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这两次争论涉及农村土地改革后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主张趁热打铁，改变私有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历史证明，刘少奇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完全同意刘少奇的主张。但从1953年起却批评刘少奇是右倾，开始发动合作化运动，即“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来“实行社会主义”，凭借毛泽东的威信和人民群众的热情，仅一年多全国就基本完成。合作化高潮之后的后遗症尚未治愈，接着又是人民公社化，更加“一大二公”，更成为“平均的小农经济”。刘少奇断言的“危险”、“落后”、“倒退”统统发生了。

六、提倡农村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民主，赞成 “包产到户”和“责任田”

刘少奇对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方式问题做过深入研究，为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他主张“必须实行责任制”。1957年2月，他到河南调查，肯定了新乡地区实行农业社包工包产到生产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他认为，一个队二三十户，谁做活好，谁做活坏，谁吃亏谁讨便宜，农民都看得见。这样，几百户的集体所有制没有变，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变小一点，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则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他还说，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能实行个人负责制，实行社内的个人负责制。他这些闪光的思想，被“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冲断后，1959年又再次指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1960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发过渡，平均主义，是‘左’的，是不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

六十年代初，农村极少数地区在农业生产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实行“包产到户”和“责任田”。有的领导人认为“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不同意这些领导人的看法，对“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表现了积极支持的态度。1961年4月他在湖南蹲点调查期间，对公共食堂、供给制、分配、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他说，恐怕还是以产量计算，以产定分，包产到组，产得粮食多、包工即多，打破平均主义，不要把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山林也可以下放到户，分户管理。1961年夏他在听取从湖南农村调查归来的田家英的汇报时，曾明确表示赞同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同意把他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

产到户后，刘少奇虽然收回了自己的意见，但仍强调要实行责任制。1962年7月他再次指出：“河南新乡那个地方就是实行责任制，叫作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分散干，组包片（一个生产小组包一片），户包块（一户包一块），超产奖励。”“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①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实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政策调整。在农村，重点克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积极提倡生产责任制，实现经济民主。很快，全国一半以上地区实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村经济迅速恢复。“文革”时取消并狠批“三自一包”，农业再次下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四川农民率先突破“一大二公”，自发搞起改革，党中央接受了历史上的教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主动加以引导，使农村再次走上正轨。这一回归与五十年代初刘少奇倡导的农村发展道路是一致的。

七、探索分配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着眼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分配制度上，刘少奇主张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实行多种分配形式，改革劳动体制，推行合同制。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入手的。1957年4月，他指出：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按劳分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大量地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因此，刘少奇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②刘少奇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重要观点也为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奠定了基础。1961年初，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后，刘少奇又深入农村、工厂调查研究，明确指出：现在供给制部分大多了，70%的供给制，就是70%的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提出在农村要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即除了定额记工、定额管理外，还可以把一部分田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给社员适当的自留地，发展副业生产。要适当承认农民与手工业工人的差别，以提高手工业工作的积极性。在工矿企业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又要重视经济手段。要有奖励制，只有奖罚分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4页。

明，才能调动职工积极性。

在考虑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刘少奇还就如何打破“铁饭碗”，改革劳动制度的问题作了深层思考。他认为，包下来，在建国初期是正确的。但现在工厂里只进不出，给工厂和国家都带来了很大困难。他提出今后工人进厂，一律都签订合同，合同上有期限。满期了需要可以再签，不需要就不签。这也是一种劳动制改革，叫做劳动力自由市场。他认为固定工弊病很大，造成了一些人的封建思想。主张在一个时期内，固定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可以并存，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按照合同制的思路，从1958年起在四川等地进行了劳动制度的改革。1964年中央工会会议上，刘少奇又重申改革劳动制度的主张，并在全中国推广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八、思考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实现形式， 主张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成为执政党并在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实行正确而有效率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平时了解的情况和各地负责人的汇报中，刘少奇深深感到，党正处在从领导社会变革向经济建设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党的各级机关在领导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还十分缺乏经验，处于很不得力的状态，必须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多次提出：“我们熟悉的事，如打游击、土地改革等现在都完成了，而不熟悉的事，如基本建设、五年计划等却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没有经验，因而很吃力，很被动。现在要创造新的领导经验。”^①刘少奇认为，要完成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要实行党政分开，要改变过去由党委包办一切、“一揽子”的领导方法。他说：“党委整天忙，不能管党，管了什么？管了征兵、统购统销、基本建设等业务；而这些事应该是由业务机构来管的。党应该管的是检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刘少奇较早就提出了“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原则，他强调经济工作应当重视和尊重价值规律。1963年10月，刘少奇在同薄一波等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实行的领导经济的办法是一种“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②同年末他在谈话中又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苏联没有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我们也没有解决。将来势必要解决。”^③“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刘少奇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设想。从这一设想出发，他在

① 刘少奇同东北地区各省市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5年4月9日。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③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实践中主要抓了工业管理体制和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在当时引起较大影响的试办托拉斯的尝试和对物资工作的改革试点。

刘少奇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至今不能说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刘少奇的这些主张,对我们今天探索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九、注重高层研讨和基层调查,以理性的思考

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纠“左”

刘少奇是一个务实的领导人,他一向主张实事求是,认为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十年代初,他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他主张农、轻、重的排列次序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他反复强调不要吹牛,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他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约请了中央和国务院三十七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研讨经济工作,对国民经济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若干重大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积累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为八大报告的起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受刘少奇高层研讨的启发也“床上床下”的听取了各部委的汇报,后来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困难,1960年7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了调整经济的任务。刘少奇在会上有个讲话,针对调整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国民经济困难问题。是年冬,中共中央、毛泽东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重申我党“实事求是”的作用,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4月,刘少奇亲自到湖南农村基层蹲点调查了40多天,广泛听取了农民的意见。刘少奇针对当时的“共产风”,“瞎指挥”以及公共食堂等问题坦率地讲了他的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同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呼之欲出,这在当时的确需要一种勇气。因此,他力主把历年钢铁生产的高指标调低一点,“‘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①这种敢于抵制高指标的气魄,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更进一步提出:“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标准”。谈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刘少奇指出:“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果断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二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少奇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讲真话，冲破了当时的一些思想禁锢。在改革发展的今天，更需要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这方面，刘少奇所具有的共产党人的修养，堪称是我们的楷模。

刘少奇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以开拓者的姿态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呕心沥血，他关于根据中国特点进行建设，平均不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多样性和灵活性；关于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的关系；关于农、轻、重比例；关于四个现代化等经济思想和理论都有很多重要的论述。这一系列具有先见性的真知灼见，是现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的认识，尚未穷尽，我们需要认真挖掘和发展，进一步指导今天的改革实践。